

# 文物裡的「汪星人」

狗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，這份跨越物種的情誼，在中國大地上延續了逾萬年。那些沉睡在地下、珍藏在博物館中的犬主題文物，就像一部無聲的史書，記錄了狗狗陪伴人類的全過程。

## 史前時代：從荒野獵手到人類夥伴

狗是人類最早馴化的家畜，距今一萬多年前，中國境內的先民已開始馴化狼，使其成為人類的夥伴。

距今 9000 至 7500 年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，發現了十幾處狗坑，多位於居住區或房址附近，坑中的汪星人彷彿仍在履行守護營地的職責。

賈湖遺址的發掘報告顯示，這些家犬的體型已經明顯小於野生狼，牙齒也出現了馴化帶來的退化特徵，說明它們已經通過人類餵養，不需要再靠野外撕咬獵物為生。

江蘇蘇州馴養狗的歷史也很悠久，距今一萬多年前的太湖三山島遺址中有「最後鬣狗」化石，印證了吳地史前有豐富的犬科動物資源，為先民馴化狼作為狩獵夥伴提供了自然環境與實踐思路，距今七千餘年的馬家濱文化吳縣草鞋山遺址出土的犬類頭骨，形態介於狼與現代家犬之間，是由狼馴化而來

## 夏商周：祭祀與狩獵裡的犬

夏商週三代，中國早期的禮儀制度逐步發展成型，狗的角色也隨之轉變，成為了祭祀、喪葬等重大活動中的組成部分。

在商代，狗常作為祭祀的犧牲與墓葬的殉葬品。考古發掘顯示，商代的祭祀遺址裡，經常能發現狗的骨架，而在商代的墓葬中，「腰坑殉狗」更是一種常見的喪葬習俗，人們會在墓主棺槨下方挖掘腰坑，坑內殉葬狗。這種制度在殷墟遺址體現得最為明顯，有超過一半的墓葬設有腰坑，坑裡埋著狗。

1976 年，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了一件勾雲紋回首犬浮雕玉飾。玉犬整體呈匍匐姿態，回首後視，耳朵微微翹起，尾巴貼著腿部下垂，以勾雲紋展現身姿。犬尾下垂，盡顯恭順之態，而其回首的姿態，似是聽到了身後主人的呼喚。婦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，也是中國歷史上有明確記載的第一位女將軍，

## 秦漢：從朝堂到市井的犬之趣

秦掃六合，漢定天下，大一統王朝帶來了穩定的社會秩序，狗也從青銅時代的禮儀祭祀場景，走入尋常市井人家。

秦代關於狗的最著名記載，來自《史記·李斯列傳》。秦朝丞相李斯被趙高陷害，判處腰斬之刑，臨刑前，他看著和自己一起赴死的兒子，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，「吾欲與若復率黃犬，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，豈可得乎！」（我現在最懷念的，是和你一起牽著黃狗，出上蔡東門去打獵追兔子的平凡日子，可這樣的日子，再也回不來了）。吳人陸機在臨刑前，同樣追念昔日在華亭聽到的鶴鳴，上蔡黃犬不自由，華亭鶴唳恨功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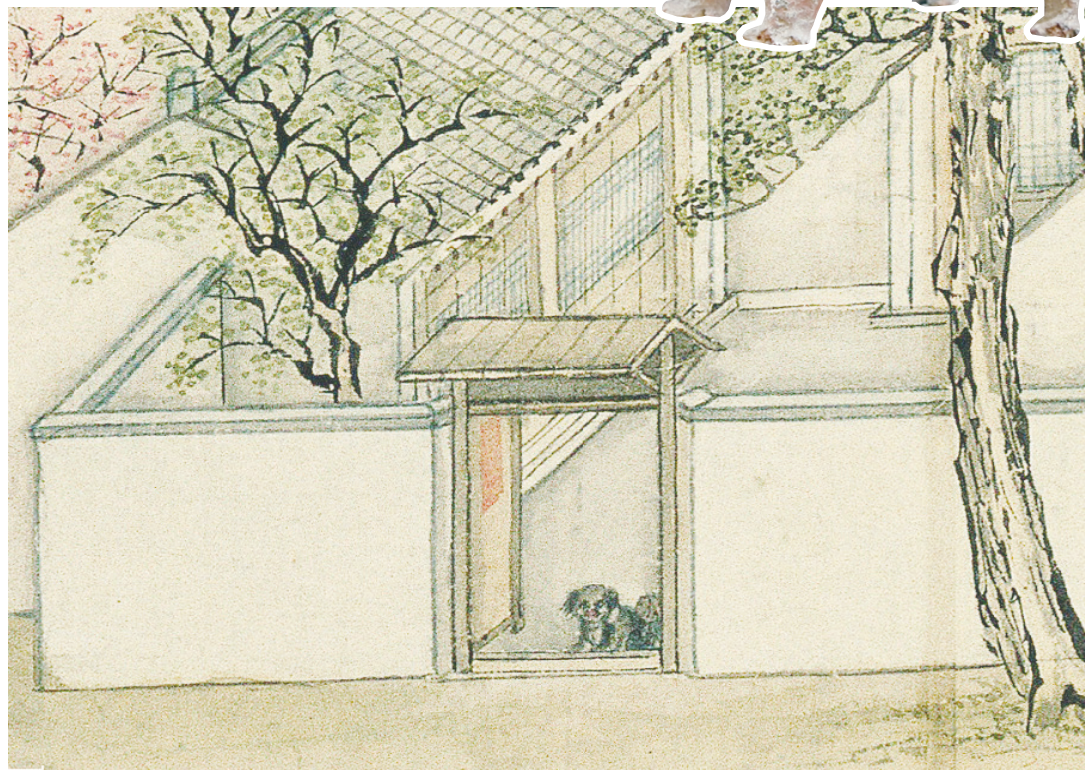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漢代，養狗的風氣更為盛行。漢代墓葬中出土了數量極多的陶狗明器，這些陶狗造型各異，生動寫實，宛若一部直觀反映漢代犬類品種與樣貌的實物圖譜，讓後世之人能清晰地看到兩千多年前，中國人養的狗是什麼樣子的，其中河南博物院內的左臥姿紅釉陶狗較為典型。此陶犬雖作臥姿，卻昂首伸頸，張口吠叫，耳朵豎起，尾尖上翹，彷彿正在對著闖入家門的陌生人發出警告，把看門狗的神態與氣勢展現得淋漓盡致。

漢代的宮廷裡，狗更是皇帝的心頭好，甚至鬧出了不少荒唐事。

《後漢書·孝靈帝紀》裡記載，漢靈帝劉宏「又於西園弄狗，著進賢冠，帶綬」。進賢冠是漢代文官上朝時戴的禮帽，綬帶則

►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新石器時代晚期獸形灰陶鬲

▼遼寧省博物館藏清代徐揚所繪《姑蘇繁華圖》裡的狗。



的家畜遺存，距今六千多年的吳江廣福村遺址出土的犬類遺骸，進一步佐證了吳地悠久的養狗歷史。

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，狗已深度融入先民的日常生活，還成為了器物創作的重要主題，最具代表性的是大汶口文化的狗形鬲。這件文物 1974 年出土於山東省青島市膠州市三里河遺址，整隻陶鬲塑造成昂首挺立的凶狗姿態，帶著原始的攻擊性。狗身部位為鬲的盛酒腹，微微張開的狗嘴是倒酒的流，向上捲曲的狗尾則做成了方便握持的鑿手，四條短腿穩穩地支撐著器身。

狗形鬲的出現，表明先民對犬的形態特徵已極為熟悉，能夠將日常實用器具與犬類造型有機融合。其設計更是獨具匠心，狗頭上揚的造型，可防止加熱時液體溢出，捲尾狀鑿手符合現實中狗尾上捲的場景，四足能保障器身穩固，又便於下方生火加熱。

這件玉犬出土在她的墓內，足以說明狗在她心中佔據著重要的地位。

到了兩周時期，人們已經根據狗的功能，劃分出了明確的品種分類。《詩經·秦風·駉》裡有「駉車鸞鑣，載獫狁。」獫狁（xiǎn yǎn）為長喙犬，駉為短喙犬，長嘴的獫適合遠距離追逐獵物，短嘴的駉則適合近距離搏鬥撕咬。這說明在春秋時期，秦地先民已根據獵犬的特徵，形成了較為細緻的品種劃分。

蘇州地區有關養狗的記載，可追溯至春秋晚期。

據《吳越春秋》記述，吳王闔閭「晝遊蘇台，射於鴟陂，馳於遊台，興樂石城，走犬長洲」，文中所載五處地名，其中用來走犬的長洲還成為縣級行政單位。宋代學者朱長文在《吳郡圖經續記》中，還專門將吳王縱犬狩獵之所稱作「走狗塘」。

是官員身份等級的象徵，漢靈帝給自己養的狗戴上進賢冠，繫上綬帶，將它們當作官員。這則記載雖然荒唐，卻也說明狗在帝王心目中佔據重要位置。

蘇州金城新村遺址的秦漢時期地層出土了大量狗骨，印證了秦漢時期蘇州城區一帶存在養狗習俗。值得關注的是，西漢時期，揚州發生的一起丟狗事件，或與蘇州人存在關聯。據出土木牘記載，一名叫遂的官員曾記錄：

臣遂家人出，逢一男子牽之。言曰：郎中周吳人學之，吳人得之。

遂所養之犬走失後，其家人外出時，偶遇一名男子牽該犬閒逛，便上前問詢。該男子稱，此犬為郎中周吳人所養，自己是從其處取得，並未偷盜。「周吳人」存在兩種解讀，一是指姓周，名吳人，二是指名為周的吳縣人。若按第二種解讀，則該起丟狗事件與蘇州存在關聯。沒想到，寵物走失這一令現代人困擾的問題，在古代亦同樣存在。



▲圖 1 為河南博物院藏漢代左臥姿紅釉陶狗；圖 2 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商代晚期玉回首狗；圖 3 為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清代郎世寧繪《十駿犬霜花鵲軸》。

## 魏晉至隋唐：胡風與雅趣中的犬

魏晉南北朝的亂世，並未中斷國人與狗相伴的歷程，到了大唐盛世，絲綢之路的萬里繁華，帶來了西域的新風，也帶來了新品種的犬類。

犬類忠誠相伴、通人性之特質，以西晉文學家陸機所飼「黃耳」最為典型。據《晉書·陸機傳》記載：

初機有駿犬，名曰黃耳，甚愛之。既而羈寓京師，久無家問，笑語犬曰：「我家絕無書信，汝能繼書取消息不？」犬搖尾作聲。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系其頸，犬尋路南走，遂至其家，得報還洛，其後因以為常。

黃耳聰慧機敏、善解人意，往返於洛陽與吳地之間傳遞家書，使陸機及時獲知家中近況，消解羈旅思鄉之愁。「其後因以為常」一句，足見初次傳書時主犬皆感新奇，後經多次往返已成常態，亦印證黃耳傳書之事屬實。

這般頗具靈性的毛孩子卻未曾留下樣貌，後人或可從蘇州吳文化博物館所藏西晉青釉瓷狗圈中略窺其形。圈中之狗呈坐臥之態，尾巴上翹，微微抬頭，乖巧可愛，明顯是一副對著主人撒嬌的模樣，想必黃耳見到陸機時，便是這般模樣。

唐代中國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盛世，絲綢之路的暢通，讓東西方的文化相互交融、商品互通有無，沿著這條萬里商路源源不斷地

傳播，其中就包括了來自西方的汪星人，如《舊唐書·高昌傳》裡記載：

（武德）七年，（高昌王）文泰又獻狗雄雌各一，高六寸，長尺餘，性甚慧，能曳馬銜燭，雲本出拂菻國。中國有拂菻狗，自此始也。

高昌王鞠文泰進貢的這對拂菻狗，身高只有六寸，長一尺多，換算成現在的單位，身高不到 20 厘米，體長只有 30 多厘米，非常小巧，而且極為聰明，能牽著馬的韁繩，能叼著蠟燭。此種拂菻犬的樣貌，見於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《雙童嬉戲圖》。圖中左側孩童懷中所抱小狗，毛色黑白相間，毛髮微捲，體型小巧玲瓏。學術界認為此捲毛小狗即為現代哈巴犬的雛形。

唐代的犬類，除了成為觀賞寵物，仍是狩獵活動中的重要角色，如唐章懷太子李賢墓壁畫《狩獵出行圖》生動再現了唐代皇室貴族狩獵出行的恢宏場面，數十名騎手駕乘駿馬，攜旗執兵，列隊浩蕩奔赴獵場，其中各類獵犬尤為醒目。

畫中獵犬品種多樣，既有身形高大、矯健迅捷的大型獵犬，亦有體型纖巧的細犬伏於馬背，更有數隻小型觀賞犬由隨行人員攬懷伴行。這些獵犬中的典型當屬波斯犬，其狩獵時性情勇猛、奔逐迅捷，多由波斯及中亞諸國作為貢品進獻而來。



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的唐代《雙童嬉戲圖》。

## 宋元明清：畫軸與案頭的犬之暖

從宋元的市井繁華，到明清的俗世安穩，狗成為了民俗文化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宋代為中國歷史上市井文化高度繁榮的時期，這一點在寵物行業中體現得較為明顯。

據孟元老《東京夢華錄》記載，北宋都城汴梁的相國寺附近，形成了售賣貓狗等寵物的市集。彼時已出現為貓狗美容修飾、供應專用飼料等專門行當，值得關注的是，商戶已能順應時節推出對應的寵物食糧配方，如夏季側重清熱解暑，冬季注重溫補調養，其經營思路與現代寵物食品行業的理念頗為相似。

宋代的文人畫家們，也把狗作為繪畫的主題，其中最經典的作品，就是李迪的《獵犬圖》。畫作中的獵犬雖在站立，整體姿勢呈現左高右低，垂首貼耳，顯得頗為溫順，應該經受過專業的訓練。此類獵犬為中國傳統品種，也是現今山東細犬、陝西細犬的前身，其奔跑速度快、耐力出眾，是獵人的得力助手。蘇軾《江城子·密州出獵》中「左牽黃，右擎蒼，錦帽貂裘，千騎卷平岡」的詞句，其所牽之黃，推測即為《獵犬圖》中同類犬種。

以反映農村田園生活著稱的范成大在詩中提及狗的次數頗多，筆下的狗大多不離看家護院的本色，如《晚春田園雜興》中「雞飛過籬犬吠聲，知有行商來買茶」，《上沙》中「水邊犬吠隔疏林，籬落蕭森日半陰」，以及《臘月村田樂府·燒火盆行》中「兒孫圍坐犬難忙，鄰曲歡笑遙相望」，這些詩句皆圍繞犬吠護院、伴守田家這一場景展開。

明代文獻中關於犬類故事的記載更為傳奇。據明代蘇州文人陸粲所著《庚巳編》記載，

蘇州閭門一典當行養有一犬，該犬守在主人父親埋藏銀兩之處，恪盡職責，後因傷人，主人為賠罪，決定將其烹殺，然受傷者夢到犬咬人之原委，急忙說與主人聽，可犬已化為鍋中肉，主人追悔莫及，遂對該犬予以悼念，並隆重安葬。

至清代，民衆對犬類的喜愛之情更勝往昔，其中尤以乾隆帝與他的十隻愛犬最具代表性。宮廷畫家郎世寧奉旨為乾隆帝創作《十駿犬圖》，畫作融合西洋寫實光影技法與中國傳統筆墨線條，將十犬神態刻畫得惟妙惟肖。十隻獵犬各有名號，分別為霜花鵲、談（shàn）星狼、金翅獫、蒼玉蚪（qiū）、墨玉璃、茹黃豹、雪爪鷹、蒼空鵲、斑錦彪、蒼猊（ní），隻隻身形矯健、神采靈動，是乾隆帝木蘭秋獵時的得力助手。

回望中國古代，狗主題文物與四靈、龍鳳等動物紋飾有所不同，未呈現明顯符號化發展趨勢，亦未成為服飾上的常見元素，多以獨立主體的形象留存於世。以獨立主體為特徵的犬類文物大致可分為立犬與臥犬兩類。昂首站立的犬類造型，多呈現威懾姿態，似有警戒吠鳴之態，垂首臥地的犬類造型，則多展現溫順親和之姿，宛若與人撒嬌。立犬類文物主要出現於新石器時代，彼時犬類作為人們的生產工具，用於協助狩獵及看家護院，進入歷史時期後，犬類逐漸成為人們的生活夥伴，承擔起情感陪伴功能，因此臥犬類文物更為常見。

作者 / 吳甘浦  
本版圖文摘編自「蘇州吳文化博物館」  
微信公眾號